

叶君健全集

第一卷 短篇小说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 君 健 全 集

- 第一卷 短篇小说卷
- 第二卷 中篇小说卷(一)
- 第三卷 中篇小说卷(二)
- 第四卷 长篇小说卷(一)
- 第五卷 长篇小说卷(二)
- 第六卷 长篇小说卷(三)
- 第七卷 长篇小说卷(四)
- 第八卷 长篇小说卷(五)
- 第九卷 儿童文学创作卷
- 第十卷 儿童文学翻译卷
- 第十一卷 戏剧·小说·诗歌翻译卷
- 第十二卷 安徒生童话(一)
- 第十三卷 安徒生童话(二)
- 第十四卷 安徒生童话(三)
- 第十五卷 安徒生童话(四)
- 第十六卷 散文卷(一)
- 第十七卷 散文卷(二)
- 第十八卷 散文卷(三)
- 第十九卷 散文卷(四)
- 第二十卷 散文卷(五)

叶君健全集

第一卷

短篇小说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君健全集/叶君健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302-21292-8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叶君健(1914—1999)—全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974 号

叶君健全集

责任编辑: 马庆洲 王舒妹 胡苏薇

装帧设计: 曲小华 韩宇

责任校对: 宋玉莲 王凤芝 王荣静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240 总印张: 499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80.00 元(全套)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08061-0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出版说明

叶君健(一九一四—一九九九),湖北红安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国际文化交流专家。

一九三三年,叶君健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即从事创作、发表小说,一九三六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发起并参加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三八年初,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任职,负责接待来武汉或途经武汉到延安解放区参观访问的国际友人,并做翻译。一九三八年赴香港任《世界知识》杂志编辑,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一九四四年,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邀,叶先生赴英国各地巡回演讲一年,共演讲六百多场,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业绩。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得到英国“研究员基金”,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并从事英文文学创作,发表短、长篇小说和童话作品多部,反响极好。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转道香港,奔赴祖国。回国后,先在外联局编译处工作,之后参加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的创办工作,并于一九五三年调《中国文学》任副主编。一九七四年,调外文局《人民中国报道》任顾问。一九九三年离休。

叶先生曾先后担任过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理工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一九四八年作为远东代表出席“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一九八三年,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终身名誉讲师”称号;一九九一年,国务院表彰他为“儿童文学先进工作者”;一九九五年,中国作协授予他“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功勋纪念章。他还是世界笔会的委员,英、美笔会的全权会员,全世界著名的“达芬奇文艺奖”的评委,国际世界语学会的执行委员。

叶君健先生通晓英、法、意、德、西、日、丹麦、挪威、葡萄牙及世界语等十

多种语言,他以语言为工具,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他同乔冠华、袁水拍、钱锺书等将《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法文,发行到全世界;在前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通过主编的《中国文学》,向全世界译介了二千五百余万字的中国古今名著;他花数十年心血,采用英、法、丹等权威版本,翻译并评注、研究世界名著《安徒生童话全集》,是这部世界名著的最有权威性的中文译者,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因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辉煌业绩,他荣获丹麦女王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奖。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叶君健先生笔耕不辍,勤奋写作,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统计,他一生创作、翻译的作品达一千一百余万字。他创作的八部长篇小说,形成反映中国人民一个多世纪革命历史的宏伟画卷,《寂静的群山》系列在国内还未出版时,就在英国负有盛名的现代派出版社费伯出版社翻译出版;他能用中、英、世三种语言从事文学创作,十九岁时的处女作《岁暮》用世界语写就,用英语创作的长篇小说获得了极高荣誉,如《山村》在英国和世界引起轰动,曾于一九四七年被英国书会推荐为“最佳书”,译本达二十几种。

为了充分反映叶君健先生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成就,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保存一份资料,我社决定将能够搜寻到的叶先生的著作汇为一编,定名《叶君健全集》,隆重推出。各卷前面均有简短“说明”,主要交代该卷作品的写作、出版情况和编辑中需说明的问题。《叶君健全集》共分二十卷,计收录短篇小说一卷,中篇小说二卷,长篇小说五卷,儿童文学创作一卷,儿童文学翻译一卷,成人名作翻译一卷,安徒生童话四卷,散文五卷。同时,我们收录了叶念先、叶念伦整理的《叶君健生平年表》,张宏琴和许京生辑录的《叶君健创作和翻译作品出版目录索引》、《叶君健编选作品目录索引》和《叶君健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以方便读者了解叶先生的生平及创作。

在编辑过程中,大致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所收著作,注意选用较好的底本,即相对出版晚近、内容较为完善的本子,或经过作者、出版社修订过的新本。著作原属繁体者,一律改为简体,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规范,施以新的标点符号。

二、所收作品,尊重作家和保持作品的风格,词语一般不做改动。对个别用字(主要是一九八六年十月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调整之字)及标

点,进行技术性规范处理,各卷之间也不强作硬性统一。对叶先生曾在原书上做过的改动,整理时注意加以利用;原书中的排版错误,一经查实,径直改正,不出校记。

三、各卷次的作品按体裁编排,但有时须兼顾每卷字数的相对平衡。

《叶君健全集》的出版工作得到了叶先生家属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在《全集》整理的过程中,李保初教授及夫人周靖女士做了大量的搜集、整理等基础性工作,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在此谨表示感谢。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寂静群山

(序一)

爱泼斯坦

我是一九三八年春天任美国合众社驻武汉的记者时开始认识叶君健的，那时他二十四岁，和我同岁，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务是对外宣传，即及时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事迹翻译成英文，再由我来润色。

日军占领武汉前，我们又先后撤到了香港，我任英文《香港日报》的主编，他是《世界知识》杂志的编辑，而在业余时间，主要是夜晚，我们俩又无偿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作家》作英文版的编辑工作，仍主要是由他把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文章翻译成外文，由我来润色；其间我们还不时把从驻香港的廖承志先生那里转来的延安解放区的抗日文章，包括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仍以他翻译我润色的合作方式，第一次一页页地从我俩的英文打字机上打了出来，再整理成册，辗转拿到国外去发表。

后来，我们又都到了重庆，他任中央、复旦和重庆三个大学的英文教授，我依旧是记者，同时他业余时间翻译一些解放区的小说，仍主要由我来润色，拿到国外，包括莫斯科的《国际文学》杂志上去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们又意外地在伦敦碰面，他刚刚结束了应英国政府邀请，在英国全国作了整整一年达六百多次的巡回演讲的战时工作，那是为了宣讲英国的同盟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迹，以配合英国政府为准备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最后摧毁德意法西斯的大反攻战役而鼓舞英国人民的士气；然后叶君健便开始用英国政府奖励他战时工作的研究员基金，在剑桥大学研究英国文学，同时用英文出版了很多介绍中国革命的小说，其中《山村》还被英国书会推荐为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最佳作品”(Best

Writing)。这时我们俩又有了一段很有特殊意义的合作,他把我从延安带来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翻译成了英文,由我联系的英国广播公司的乐团演奏了它。

君健于一九四九年一听到新中国要成立的消息后,就毅然放弃了剑桥大学拟聘请他创建中文学科的机会,于八月份启程回国,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上辗转航行了将近三个月,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了阔别了六年的祖国怀抱。

解放后不久,他就创办了大型英法文版的文学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对外介绍古今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专事为中国的其他作家“作嫁衣”。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主编了近三千万文字;同时,他还认真研究了海外英法西德意等文本的十多种《毛泽东诗词》的译本,向中央汇报了其中的很多误解和误译,建议出版中国正式的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并组织钱锺书和我等中外专家翻译出版了英文版的《毛泽东诗词》,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先后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译全了中央陆续发表过的所有毛泽东诗词,使其英文译本成为继而翻译为其他外文的权威蓝本。

“文革”后期,君健又被调任世界最大型的世界语刊物《人民中国报道》(*Popola Cinio*)的顾问,直到八十岁的高龄,患上了严重的癌症,才被批准离休。

他解放后一直工作的这两个大型外文刊物《中国文学》和《人民中国报道》的行政编制,又都同属于我任主编的外文刊物《中国建设》(*China Construction*)的上级主管部门外文出版局,因此我们又在北京百万庄外文出版局的同一座办公楼里共同工作了三十多年,经常见面。

我解放后加入了中国国籍,被选为政协委员,他曾经当选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以我们还经常在人民大会堂的同一“新闻出版组”里共同商议过国家大事。

可以说,从二十四岁起,我们俩就是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同事,为着共同的目标——中华民族的抗日、解放和建设事业,发挥我们的外文特长,进行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叶君健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一向是任劳任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无条件地服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在这方面,我是他最久的历史见证人。

但是,作为最了解他的老朋友之一,我深知他虽然从来没有当过专职的作家,但他个人的最大爱好就是文学创作,并且在这些方面还作出了独特、多样和大量的成就。

其独特性如下:

他把人的一生都毫无怨言地献给了祖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促进他们间的互相了解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本职工作,他的一切文学创作和翻译大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写出来的,以至于在他八十岁离休后,在与致命的癌症作斗争、抢时间得以集中写作了几年时,才自我调侃地说:“我终于在八十岁后才成为梦寐以求的专业作家”。

他是中国,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用中文、英文和世界语三种文字发表文学创作,用十多种文字进行文学翻译的作家和翻译家。

他十九岁时发表的第一篇处女作《岁暮》,不是用他的母语中文,而是用世界语写就的。

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现实主义和中国文学界不多的“白描”手法,这基于他受被西方称之为“超高级知识分子学派”,接受过他这唯一一位中国人的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学派的主流写作手法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基本写作态度:“我只不过是以与读者平等,而非教训他们的地位,给他们讲个故事,让他们自己去判断而已。因为我知道,读者中一定有很多比我还高明的人,如果我去直接告诉他们好坏善恶就太幼稚了。”

也正是他基于这种其实很简单和朴实无华的写作手法,使他在用外文表达的对外宣传作品中更容易让西方人信服和接受,很多西方读者表示只有从叶君健的作品中才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会成功地发生了共产党的革命。

更有趣的是,尽管西方的出版界只出版体现中国落后或者具有不同政见意味的中国小说,并明知叶君健作品的政治观点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革命的,在中国文学界出现模仿西方“现代派”写作手法热的同时,英国最大的“现代派”出版社费伯出版社(Faber and Faber)却主动出版叶君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秘密写就的三部曲《寂静的群山》,其中包括他在四十年前出版的“最佳作品”《山村》,因为他们是把他的作品作为“具有现代派”手法的“文学作品”来发表的。

其多样性如下:

从形式上,他出版过两部三部曲,多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游

记等；翻译过小说、戏剧、诗歌等。

从内容上，他写过史诗般的中国革命，优美的爱情篇章，解放前被忽视的下层劳苦大众，解放后的市井百姓，解放前后的妇女题材，“文革”前后的社会变化，国外和甚至写作时尚未去过的国家各阶层人士的故事等。他往往能把一般看作十分平庸无奇的生活琐事写得极其深刻，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充分体现了他具有广博的中外社会阅历和独到的眼光与见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深刻的成人文学作品外，叶君健还在儿童文学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第一次从丹麦文，严谨地参考英法德日文译本，创造性地把十六卷本一百六十八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翻译成了中文，被西方评为全世界几百种《安徒生童话全集》的译本中最好的两种译本之一；他还专门写出了感人至深，极具文学价值的安徒生传记《鞋匠的儿子》，并为安徒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评介先后作了四十多年的工作。为了表彰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叶君健在一九八八年被丹麦女王封为丹麦的勋爵。他翻译的美丽的安徒生童话影响了中国几代的少年儿童，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创作，以至于他在中国的名字往往仅和安徒生连在一起，被误认为“只不过是位儿童文学的翻译家”。

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创作过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发挥其外文和文学创作特长，独创了他称之为外国儿童文学的“移值”，即把外国儿童文学不是直译，而是适合中国儿童的特点进行改写；为了促进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他还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唯一涉及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翻译、移值和理论的四大方面。

其大量性如下：

叶君健主要利用业余时间发表过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共有一千一百多万字，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外文，三分之一献给了儿童文学，这即使是在他梦寐以求的专职作家中也是很少见的。

尽管叶君健具有这么多的独特、多样和大量性，也许是由于他很多外文的优秀作品还不为国人所知，他执着地追求高标准的严肃文学而不得畅销，他独行外文与世界而不属于他那一代中国作家的任何类型的流派，和他只知耕耘，没有时间也不事自我宣传的个性，他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还没有应得的地位，他的独特、多样和大量性仍只能是犹如他写的那部三部曲的书名那样的“寂静的群山”。正如深入研究过叶君健的文学作品的文学评论家李保

初先生所说的：“叶君健是一本大书，是一座有待深入发掘的富矿，是一道在延伸的美丽的风景线，是从小山村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今天，清华大学出版社以独到的眼光和魄力，把《叶君健全集》这样一座“寂静的群山”和“有待深入发掘的富矿”集中呈现给读者，不但使我这样的一位与叶君健共事最久的老同事、老战友和老朋友深感欣慰，相信对丰富开阔广大读者的眼界和中国与世界文学的接轨和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〇〇四年四月三十一日

附

这是中国籍波兰人，全国政协常委爱波斯坦先生为纪念叶君健的题词：“纪念我的老朋友，进步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叶君健，我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认识他几十年，他给中国和外国的读者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In memory of my old friend, the progressive noted writer and translator Ye Zhongjian whom I knew for decade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and who has left a precious heritage to his Chinese and foreign readers.

And in tribute to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Hongan County, who fought so long and sacrificed so much for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Janac Epstein
Beijing 2000

怀念叶君健同志

——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位卓越先行者(序二)

吴文焘

我认识君健同志，是一九四八年夏天在波兰伏洛斯瓦夫举行的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

大会的全体会议开幕前，当各国代表纷纷走进会场时，在我和我的同伴宋平同志对面，走来一位仪表大方、东方人面孔的青年。他突然放慢了脚步，望着我们，谦和又带犹疑地开言道：“请问，你们是中国解放区来的代表吗？”我们说：“是。”还没等我们打听这位陌生人的来历，他连说：“那太好了，我们就在一起坐吧！”

在近边的代表席上坐定，陌生人一说他名叫叶君健，使我想起在延安时就听说过抗战初期在郭沫若领导下、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用外文对外宣传的这位进步作家的名字，立刻对他产生了亲近感。接着，他介绍自己是应世界知识分子大会筹委会的邀请，和英国笔会等组织的成员一起，乘组委会租用的专机，从伦敦飞来波兰开会的。他还简约谈了他在第三厅工作结束后，怎样靠考取自费留英学习的机会，一面作为英国战时宣传部的雇员，到各地宣讲日寇侵略暴行和中国人民对日艰苦持久抗战，以及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将中国战时的进步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发表。后来才知道他那《山村》等以近代中国社会、主要是贫苦农民和其他被压迫剥削人群的反抗斗争为背景、蜚声英国文坛的英文长短篇小说和其他不少译作，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关于我和宋平同志怎样去赴会的，也向君健作了介绍。我们是头一天上午才拿到筹委会的邀请信，立刻从华沙赶来的。本来这封邀请中国解放区派代表参加大会的信，早就准备好了，但因当时东欧同我解放区不通邮

电,无法传送。正好蒋南翔同志率领一个中国解放区青年工人代表团在波兰参观访问,筹委会通过波共中央,把邀请信转给了他;由于开会在即,来不及向国内请示,赶上这时我任新华社常驻捷克的记者,正从布拉格到波兰采访,南翔同志就决定派我去。我请求从代表团领导成员中再派一人同行,以便有事商议,于是宋平同志和我当天就一同前往了。

一到伏洛斯瓦夫,我们先去大会执行主席、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处报到。在表示欢迎之后,他着重叮嘱我们一定要在第二天的开幕大会上讲话。于是在大会指定的旅舍住下,我和宋平同志便连夜研究,由我用英文赶写了一篇发言稿,主要是介绍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捍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实际情况。我们把稿子请君健看,提意见;他看过表示完全同意,说自己不准备在会上讲话了。另外,法捷耶夫还告诉我们:这次大会要确定与会国各指定一名联络员,为计划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作准备。印度代表、作家阿南德提议中国的胡适博士,法捷耶夫问我们有何意见。我们当即告诉他:胡适曾是中国一位有影响的先进文化人,但他今天自称已是坚持内战的蒋介石反人民政权的“过河卒子”,不适于这个任务;我们提出由郭沫若担任。君健听了立刻表示同意,还说他和阿南德是朋友,要向他说明情由,请他收回原议。这样,我们同君健各方面的看法都属一致,真可说是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了。果然,第二年春天,由郭沫若率领全中国文化界进步知名人士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就从解放了的北平出发,去捷克京城布拉格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了。

世界知识分子大会结束后,代表们随各自的接待单位散去,只知道君健打算不久后回国,为新中国效力。直到一九五三年我离开新华社驻捷克分社回国,到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工作,才不期与君健重逢,从此开始了我们约半个世纪的共同工作和友谊。

本来,君健在一九五〇年春回国后,就在戏剧家洪深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中国作家协会合作,创办了英文《中国文学》这个刊物,从事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刊物名义上的主编是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但实际的主编则是君健同志。一九五三年,英文《中国文学》划归文化部所属外文出版社经管出版;当我亲自到文联局去接君健来外文社时,我们的喜悦兴奋心情是溢于言表的。

无论在先前的外文出版社和后来改制的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阶段,我和君健都经常聚首,促膝谈心,从中了解到这个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的儿子并不平坦的生活道路;他忠正谦和的为人,严谨勤奋的治学精神,特别是他那上千万字的中外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使我对他衷心钦佩,认识到他不愧是新中国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事业上一位卓越的先行者。

由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后我离开外文社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中间有一大段时间我们没有机会晤面;只记得一九六七年一天晚上,外文局的一伙“造反派”青年找到我,气势汹汹地逼我揭发交代,证明叶君健是国民党政府派到国外去专门为它作反动宣传的要员,否则就把我揪回外文局批斗,这才知道君健也是在劫难逃生的了。我耐心地、但又径直地把我所了解的情况,包括他在世界知识分子大会的表现,拿出来否定他们的无理指控,这些年轻人听了很不满意,暴跳如雷,却自觉无隙可乘,只好悻悻而去,也没把我揪回去批斗。

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被调回外文局时,君健已经从英文《中国文学》社的岗位退下来,主要在家从事写作,还常作为我国各文化团体的使者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或被请去作学术报告。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君健很早就把《安徒生童话全集》译成中文出版,丹麦国王专门请君健和夫人苑茵同志到他国去作客,并授予君健国旗勋章,以表扬他在中丹文化交流上的功绩。

整整六年前,君健已离我们而去了。这是我们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事业上的重大损失。同事和朋友们非常怀念他。我想对他的一项最好的纪念,就是他的著作和译品全集行将问世;如果不久前停刊了的、他所主持创办并为之辛勤耕耘多年的英文《中国文学》,有朝一日能够复活光大,也会是对他九泉之下的一种慰藉。

二〇〇五年一月

时年九十二岁

春蚕到死丝方尽

(序三)

苑 茵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缘分,一个出生于南方贫穷的大别山区的子弟,和一位生长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孤村的流亡女子,在兵荒马乱的国难中走到了一起。

中国人民在侵略者的欺凌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大家都在苦海中搏斗求存,那就是远隔千里的君健和我的共同童年;当我们开始懂事以后,又都受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化思潮的熏陶,从而志同道合,组成了一个相依为命的小家。

我和叶君健是于一九四二年结婚的,记得我们结婚的那天晚上他对我说:“在我们家里我是最小的儿子,每当我生病时,最爱我的母亲才能为我煮一碗红糖姜水,那就是经常令我嘴谗想往的最大奢侈品了。”我对他说:“是啊,我童年感到最幸福的时刻,是过生日时妈妈才给我的那一枚鸡蛋。”原来我们俩是结在一根藤上的苦瓜。

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英语,同时又兼任复旦和重庆大学的外文教授。尽管如此,我们仍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我不得不在我们租住的乡间茅草屋的周围种了些菜,以节省菜金,而他在教完一天课后的夜晚,还要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写作和翻译。

亲身经历了国家的苦难衰败,他本想“科学救国”,但侵略者的长驱直入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君健意识到“科学救国”来不及了,受鲁迅先生应该用文学唤起民众思想的影响,他把救国的方式转到了文学创作上,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方式竟很快地成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最大个人爱好;同时,为了和世界受侵略和压迫的民族沟通,交流反法西斯的经验,鼓舞斗志,他首先学习了用途最广的英语和在被忽视的东欧弱小民族中发源和流行的世界语,随后又陆续学会了十多种外语,并除了中文外,还用那些文字

从事他最爱好的文学写作和翻译。

他十九岁用世界语发表了处女作《岁暮》，我们结婚时他常在《苏联文学》上发表文章，以后他还经常用英文写作，并翻译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到国外去发表。他用外文出版的小说充满了他那苦难家乡的乡土气息，从而深深地打动了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西方读者，其中的长篇小说《山村》还被英国的书会推荐为一九四七年七月的“最佳书”。他在国外作为作家的名声比在国内更为人所知，到了四十年代末，在欧洲已经成了一位知名的英语作家。

同时，他的外文特长却成了他多年工作的有力工具，不是文学写作，而是无条件地服从于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抗日战争期间，他的本职工作是接待来华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国际友人，并把包括毛泽东的抗日文章在内的反法西斯著作翻译成外文拿到国外去发表；他一九四四年离开我和两岁的大儿子，以及我已经怀孕，出生后不久又从楼上摔死，因而他从来没见过的二儿子，应邀去英国巡回演讲，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以配合英国政府为开辟第二战场，鼓舞英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斗志的战时总动员。他1949年底回国后不久即创办了大型英法文版月刊《中国文学》，介绍中国优秀的古今文学作品，为其他的中国作家“作嫁衣”，整整干了四分之一世纪；同时，他还主动组织翻译了《毛泽东诗词》先后达二十多年之久，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积极认真地完成了政府交给他的诸多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君健只能以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满足个人最大的爱好——文学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见缝插针”。这次清华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的这套《叶君健全集》，可以说大都是他“见缝插针”的产物。这里我不想去谈他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的成就，爱泼斯坦老写的序言已经作了很好的概括，相信读者们在读了《全集》后也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作为和他相濡以沫五十六年的老伴，我只想说，他从来也没有陪我出去游玩过；我还要经常告诉不期而至的朋友们“他不在家”，如果君健偶然被他们撞见坐久了他会伸长了胳膊看表，以至于“叶公会看表”成了很多朋友拒绝我们邀请来访的理由；他从小养成的第二大爱好是钓鱼，解放后还为此买过整套的钓具，但直到它们完全烂掉，他一次都没有去享受过这种乐趣；“文化大革命”中，他白天在机关里经受批斗，甚至皮肉之苦，晚上则由我在外面站岗放哨，他仍旧关起门窗偷写着他的三部曲《土地》和《寂静的群山》，按照他的话说：这是“钻了造反派们的空子”；他一生中得以集中写作的一段时